

# 外部威胁与民族主义<sup>\*</sup>

李 盟 (Alexander Liebman)

从 20 世纪 40 年代获得独立与解放以来，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剧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但是，这些涌动的民族主义在两国却以显著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中国，民族主义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外部，尤其是针对美、日“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印度，这一浪潮则主要由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加以动员和推动，其针对的是印度国内的穆斯林族群。中国的民族主义强调历史上西方人所强加的耻辱，而印度的民族主义则似乎与英国的殖民统治经历毫不干连。根据汉斯·科恩（Hans Kohn）的定义来区分，中国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体现，而印度则是“族群”民族主义的体现。

---

\* 作者在此感谢 Devesh Kapur、Elizabeth Perry、Andy Kennedy、Siddharth Mohandas 和杨晓明等诸位先生以及《国际政治科学》约请的其他三位匿名评阅人，他们对本文的草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1), p. 4. 请见下文我把 Kohn 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概念 (civic nationalism) 改称为“国家民族主义” (state nationalism) 所作的解释。

---

《国际政治科学》2007/2 (总第 10 期)，第 34—63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从常理来推断，相对于只经历过短暂“半殖民地化”的中国，对有着更长的被直接殖民统治经历的印度而言，其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应该比中国更为强烈。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力图完成两个任务。第一，运用政权类型、族群构成和外来威胁的性质这三个自变量，来解释民族主义在中印两国所呈现的不同形式。虽然这几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差异，但我更强调外来威胁这一变量的重要性。在这种意义上，本文属于“反转的第二意象”学派，即论证国际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第二个目的也与之相关，就是要力图证明，在引发大众民族主义运动的众多火花之中，一个最重要的导火索是日益增加的外来威胁；并且要说明，这正是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和印度的种族民族主义之症结所在。最后，我的结论是，尽管中印大众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引发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原因却是相似的。

本文将以如下顺序展开。首先，通过对文献回顾中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做简要的介绍，笔者将本文置于民族主义的分析范式框架之内。在这一部分，我对关键的术语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将要回答的问题。文章的第二部分对中国和印度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进行描述。第三和第四部分则对解释两国民族主义差异的三个自变量进行检视。最后，我提出文本的结论。

### 一、什么是民族主义？

有关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学术著作卷帙浩繁，而且观点各异，这其中既有规范性的，也有实证性的。民族主义到底是出自某种原初的身份认同，还是

---

我认为文化因素无法对此进行解释。许多论者已经指出，印度教民族主义旨在创立一种“和印度教教义没有多少联系”的国家认同。参见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8。也许传统的儒教可能有排外色彩，但早先被儒教视为“蛮族”的绝大多数群体，如今在汉族那里已经不能引起广泛的民族主义情感了。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p. 881 - 912.

一种为精英阶层所操控的富有弹性的概念？何种政府形式更有利于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哪种民族主义是“好的”，哪种是“坏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又为何在 18 世纪兴起？这些仅仅是关于民族主义众多文献所研究的问题的几个例子而已。

抛开各种各样的争论不论，人们甚至在民族主义的准确定义上都缺乏共识。从法国大革命到纳粹德国，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到亚非的非殖民化运动，从德国、意大利的统一到日本帝国在 20 世纪 30 和 40 年代的侵略，凡此种种的政治运动都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牌。面对如此的多样性，民族主义成为一个缺乏准确定义的概念。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常常被引用的赫奇特（Hechter）的定义。他认为，民族主义是“旨在使国家的边界与其统辖单元（governance unit）相一致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但是，这一定义甚至不能涵盖上面所列举的现象。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太平洋战争之时，日本实际上获得了与其统辖单元相一致的国土范围。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不仅仅意味着建立一个统辖单元，而是确保在一国之内（通常是种族民族主义）或者国际体系之中（通常是国家民族主义）获得更大的利益份额。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学者发现，通过对民族主义分类和对比进而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包容一切的定义更有利于理解民族主义。比如，赫奇特本人就把民族主义分为建国民族主义（state - building nationalism）、外围民族主义（peripheral nationalism）、民族统一民族主义（irredentist nationalism）和统一民族主义

---

比如，Jonathan Hearn, *Claiming Scotl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Liberal Culture* (Edinburgh: Polygon, 2000);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比如，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 - six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比如，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Michael Ignatieff, *The Warrior 's Honor: Ethnic War and the Modern Conscience* (London: Chat & Windus, 1998) ..

比如，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p. 7.

(unification nationalism)。还有人把民族主义分为缘于“贪婪”的民族主义和缘于“不满”的民族主义。阿素托史·瓦施尼 (Ashutosh Varshney) 则把民族主义区分为抵抗性民族主义和排外性民族主义。对这些作者来说, 这些区分即便不能作为定义, 也为民族主义的定义做了补充。

由于现有文献著作中关于民族主义定义的多样性, 笔者有责任在本文中对其所使用的民族主义给出清晰的定义, 以便明确本文究竟要解释什么。我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不太精确的工作定义: 它是被用来证明一个人群 (大于血亲群体) 与另一个人群斗争或冲突之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但是, 正如其他学者的著作, 我也同样依赖于分类而非全面的定义。

### (一) 族群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

我采用的是族群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分类方法。乔纳森·赫恩 (Jonathan Hearn) 指出: “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 一些人把民族的概念吸收到族群概念中, 而有些人则把这一概念吸纳到国家概念之中, 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紧张关系。”的确, 这种区分还要从汉斯·科恩说起。科恩将民族主义分为“族群性”民族主义和“公民性”民族主义两种类型。对于什么是族群, 我采纳的是霍洛维茨 (Horowitz) 的定义, 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群, “无论这种群体特征是肤色、外貌、语言、宗教, 还是其他藉以表明共同起源的标志或者标志组合”。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大屠杀, 就是族群民族主义的一个例子。而国家民族主义是一种谋求使国家成为与其他国家进行冲突之工具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的民族主义就是国家民族主义的明显例子。我之所以选择称之为“国家”民族主义而不是“公民”民族主义, 是因为迈克尔·伊格纳蒂夫 (Michael Ignar-

---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p. 16.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0).

Ashutosh Varshney, “Nationalism, Ethnic Conflict, and Rational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 No. 1, pp. 85 - 99.

Jonathan Hearn, *Claiming Scotl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Liberal Culture*, p. 9.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p. 17 - 18.

tiEFF) 在其《血统与归属》一书中赋予了“公民民族主义”许多规范性的内容。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公民的，是因为它把国家设想为由平等、享有权利的公民围绕共享的政治实践和价值观而凝结的爱国情结进行联合所形成的共同体。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必然是民主的。”出于这个原因，我选择使用“国家民族主义”一词，是为了说明这种意识形态谋求赋予国家间冲突以正当性，而不是暗示这一民族主义必然是民主的或道德的“好”规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显然不适合被归入族群性类别，但它的国家民族主义性质也与所谓好规范无涉。这就使国家民族主义一词比公民民族主义含义更清楚、也更少争论。我试图回答的第一个疑问，正是直接基于这种分类：为什么印度的族群民族主义远比国家民族主义强烈，而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却比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族群民族主义之争更为强大？

### (二) 精英舆论与大众民族主义

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中，不少作者都将少数极端主义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广泛的大众民族主义行为加以区分。本文明确地聚焦于各种形式的大众民族主义的起因。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期，至少在少数群体之中都会存在。但是，我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或者其滥觞于哪里。也就是说，我不参与这些“原生性”的争论。我要探究的是，为什么潜在和蛰伏的民族主义有时会突然爆发为该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被牵涉其中的运动。这种大众民族主义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典型的包括抗议、骚乱、民主政治中民族主义党派的政治获益，或者针对其他民族的暴力行为。我要解答的第二个疑问是，什么原因使大众民族

---

Michael Ignatieff, *The Warrior's Honor: Ethnic War and the Modern Conscience*, p. 6.

我有意排除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以及印度分离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我的目的在于解释两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不过，就如我在下文更多地加以讨论的，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并没有导致针锋相对的大汉族主义。

例如，参见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 226; Stathis N. Kalyvas,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75; Ashutosh Varshney, “Nationalism, Ethnic Conflict, and Rationality,” p. 88.

主义在二战后的中国和印度战后不时爆发，以及在中印两国不同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的背后是否其爆发的原因却是相同的？笔者的看法是，激发大众民族主义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不断加剧的外来威胁。

### （三）把中国和印度加以比较的原因

我明确地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正如科恩所说：“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必须采用比较的方法，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对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主义进行比较，人们才能看到它们的共同点与特别之处。”事实上，本文的立论前提就是，通过比较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能够洞察民族主义。但是，为什么要比较中国与印度？

因为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所以论者往往不把它们加以比较。通常的做法是，把印度的民族主义与其他族群民族主义相比较，而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亚洲其他的民族主义作对比或对其进行单独的考察。但是，对这两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将大有裨益。

首先，以前很少有人对这两个案例进行过比较研究，那为什么不做一个尝试呢？实际上，它们之所以很少被选来做比较，是因为研究者倾向于“根据因变量选择”案例。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性质的不同使它们不适合做比较。但是，如果从自变量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有很多潜在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有被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化的历史；都有着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民族和语言也多样化；而且二者皆属于发展中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展现出的民族主义如此地不同，这确实令人迷惑不解。

其次，尽管不同种类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本质上来说，它们又都具有某些共同之处。或许，通过比较形式上各异的民族主义，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在它们明显不同的表象之后更为相似的东西。

最后，中国和印度现在都被视为“崛起中的大国”，在 21 世纪上半叶，它们的国际影响力都将出现急剧的增长。因此，对这两个亚洲巨人的民族主

义发展方向进行比较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过，对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测量问题：中印两国在众多变量中的任何不同，都可以为它们各异的民族主义提供解释。因此，在集中考察两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复兴的民族主义时，我使用的主要方法是，依据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变化进行案例内的比较。这样就导致了更多变化的产生，从而使文章的结论更为可靠。就印度而言，我运用民族主义政党在选举中是否取胜和教派冲突的程度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印度的民族主义；我选择群众性的抗议活动作为反映中国民族主义的指标，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常规表达方式。尽管本文不是一个深入的经验研究，但还是尽量提供一些有说服力的初步证据，从而说明中印民族主义的相似性比它们看起来的差异要大，而且两者背后的驱动力量都是外来威胁。

## 二、20世纪90年代的中印民族主义

### （一）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国勃发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密切关注和透彻考察的现象。尽管这一民族主义具有很多表现形式，但它始终围绕的共同主题是：中国必须强大起来以洗刷掉西方殖民者和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的“耻辱”。正如陆伯彬（Robert Ross）和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由民族耻辱感和民族自尊心激发的民族主义。也许没有哪本书能比《中国可以说不》更好地表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这种感受了。该书出版于1996年，作者以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声称，中国不应该听任美国和日本的“摆布”，也不需要把西方视为自己的“老师”或楷模。该书一度占据畅销书的榜

---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gypt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p. 34.

Song Qiang et al., *Zhongguo Keyi Shuo Bu (China Can Say No)* (Beijing: Zhonghua Gongshe Lianhe Chubanshe, 1996).

首，直到其飙升的销售量最终被加以遏止。

但是，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仅局限于购买图书上。与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相比，最近的 15 年来，中国民众针对西方和日本的不满显著上升。可以略举一些事例。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中国许多城市自发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1999 年在很多城市爆发了旨在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示威抗议活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还遭到了民众的袭击；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后，中国民众的愤怒一直延续到了一年以后，当时在杭州举行的葬礼上，中国媒体盛赞了遇难的战斗机飞行员。除了抗议活动，其他一些微妙的迹象也表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逐渐增强：民众呼吁确定中国的“国耻日”，20 世纪之初的现象似乎在 2001 年再次复现；街头出现了“雪洗百年民族耻辱”的标语；在线网络聊天室里有越来越多的激进言论，其中不少是针对美日的激进民族主义言论。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掀起的反对日本“入常”的签名活动据称获得了两千五百万到四千万个签名。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抗议示威活动和针对日资企业的零星暴力行为。与涌动的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相比，中国国内的族群矛盾大体上无足轻重。

### (二) 印度

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也许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受学者们的关注。自从印巴分治引发了惨烈的暴力冲突后，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成

---

Peter H.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127.

Zhao Suisheng, *A Nation - State by Constru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0.

Peter H.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p. 15.

Bill Callahan, Fairbank Center Conference on Nationalism, March 19.

见 <http://www.ncn.org/asp/zgwinfo/da-Kay.asp?ID=63043&ad=3/23/2005> 关于中国人对赖斯 2005 年 3 月访问北京的态度。

参见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4408627.stm>，以及《经济学家》2005 年 4 月 16 - 22 日第 13 和 36 页的论述。

关于中国国内民族关系，可参考 <http://news.telegraph.co.uk/news/main.jhtml?xml=/news/2004/11/03/wriot03.xml>。

为印度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骚乱和死亡一直都处于显而易见的低迷时期，但此后暴乱和死亡又开始持续上升。最为严重的暴乱发生在 1989 年到 1993 年间，这场骚乱至少导致了 5000 人丧生。在 1999 年和 2002 年，古杰拉特邦再次爆发骚乱，一伙穆斯林点燃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乘坐的火车，导致 58 人死亡。随后，作为报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骚乱中杀死了数百名穆斯林。

在衡量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增长问题上，更为可靠的第二个指标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特别是印度人民党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历史上，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最多获得过不到 10 % 的选票。但是，在 1991 年 5 月到 6 月举行的选举中，印度人民党获得了 20 % 多的选票，在若干邦的下院人民院 (Lok Sabha) 中获得了多数席位。1996 年，人民党赢得了印度下院人民院的多数席位，但却无法组成一个稳定的政治联盟。1998 年，该党获得了更多的代表席位，瓦杰帕伊在 1998 年至 2004 年间出任印度总理。这是印度历史上首次由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出任政府总理。

从第三个指标来看，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目标或信条的群众运动变得更为成功。到目前为止，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印度北方邦阿约提亚 (Ayodhya) 的巴布里清真寺 (Babri Masjid mosque) 事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拉塔亚特拉 (rath yatra) 领导下的“同盟家族” (Sangh Parivar) 的组织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发起了“战车朝圣行军”以摧毁这座据称遮蔽了印度教罗摩神 (Ram) 诞生之石的清真寺。这一运动持续了好几年，直到 1992 年 12 月 6 日，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冲破警察的封锁线捣毁了这座清真寺。在阿约

---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p. 552 - 553. 在 1964 年，印度教徒的骚乱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判断，因为到 1965 年时教派骚乱所导致的伤亡数字又回到了正常的 30 人左右。

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 552.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p. 439, 554.

Sunil Khilnani, *The Idea of Ind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roux, 1999), p. 149.

提亚的其他地区，穆斯林被殴打和杀害，他们的房产也被放火焚烧。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针对国内另一个族群的族群民族主义。确实，正如霍普金斯大学苏尼尔教授（Sunil Khilnani）所指出的那样，阿约提亚不是一个“能对殖民屈辱产生共鸣的地方”。

### （三）民族主义者的目的

民族主义者们真的想获得他们所声称的东西吗？抑或这些抗议事实上是与民族主义完全无关的经济或政治上的不平等所引发的表象？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可以被操纵和利用以达成各种目的。例如，在一些中国军人看来，民族屈辱和国防建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因此，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助其争取更多的军事预算。商人们也不会错过民族主义这一促销手段，图书和杂志因刊发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章而斩获了可观的利润。在2005年4月爆发的新一轮反日浪潮中，有报告显示，利用这一次允许上街抗议的机会，有着不同不满情绪的群体纷纷走上街头，宣泄各自的不满。印度的情况与此类似，有学者指出，人民党实际上是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来动员低等种姓民众对有利于印度富人的经济政策的支持。（用现在的行话讲，就是“诱饵销售法”。）诸如20世纪60年代的护牛运动这类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题，有时被认为是故意摆出的愤世嫉俗姿态以争取选票。但是，民族主义是一种托词的说法并不能解释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一合意的、有利可图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版本是一种指向外部的国家民族主义，而在印度却是针对国内其他族群的族群民族主义？

---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 455.

Sunil Khilnani, *The Idea of India*, p. 152.

Bill Callahan, Fairbank Center, March 19.

参见 [http://journalism.berkeley.edu/projects/chinadn/en/2005/04/huge\\_protests-f.php](http://journalism.berkeley.edu/projects/chinadn/en/2005/04/huge_protests-f.php) ;  
《经济学家》杂志2005年4月16-22日，第13和16页。

Sugata Bose and Ayesha Jalal,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State and Politics in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42 - 143.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 212.

## 三、对中印民族主义差异的不充分解释

### (一) 政权类型

印度采取西方民主制度而中国奉行东方威权制度是否可以解释两国民族主义相异的性质呢？谢普斯（Shepsle）和拉布什卡（Rabushka）最早从理论上论证了民主（即所谓“竞争性的政治体系”）如何加剧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问题。一旦族群成为某个社会的主要分野标准（他们并没有试图探讨这种分野何时以及为何形成的问题），为了获取本族群的投票支持，政客们倾向于表现出比竞争对手更为激进的立场。他们写道：“以教派为基础的政客谋求教派问题在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地位，以此胜过那些态度模糊的多族群联盟。（当面对此种政治威胁的时候）合作和互信的花言巧语听起来就显得很脆弱……并且容易受到政治竞争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准确地描述了独立后的印度政治：很多民族主义政党包括从印度人民同盟（Jana Sangh）到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印度人民党，都企图通过进一步强化族群分野以赢得印度人的忠诚，从而在议会中占据多数。

很多关于印度的研究也认为，民主政治固有的竞争性在族群冲突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推波助澜作用。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在关于阿里迦（Aligarh）邦族群骚乱的书中指出：“印度的教派骚乱是以其他形式呈现的教派政治的扩展和延续。”他以一种与拉布什卡和谢普斯相类似的逻辑解释道，骚乱发生“在一个高度政治动员和激烈的选举竞争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中

---

Alvin Rabushka and Kenneth Shepsle,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Columbus: Merrill, 1972).

Alvin Rabushka and Kenneth Shepsle,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pp. 83, 90; Ben Reilly, *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Milton Esman, *Ethnic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aul Brass, *The Production of Hindu - Muslim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Indi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3), p. 242.

骚乱被用来巩固来自具有种族、宗教或其他文化特征族群的支持……”。这导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肉体上和言语上攻击穆斯林，以此来增加他们的选票份额。托马斯·汉森（Thomas Hansen）认为，民主竞争不仅使部分政治精英将印度教民族主义当作战略选择，而且民主政治首先便利了印度教的身份构建。他认为，“民主产生了对社会的一种新的构想，这种构想使新的身份和主张有可能出现，并且为新的暴力冲突形式、新的权力幻想和排外主义创造了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讲，印度教民族主义是过去十年中一系列激烈的选举斗争的产物。

关于中国民族主义这类主题的著作很少，因为不具备可以作为解释要素的西方式民主制度，所以对并不那么盛行的大汉族主义的研究就变得更为困难。而且，在理论上，中国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政治精英没有必要通过突出狭隘的族群利益来获取选票。相反，他们更为关心维护国内的政治统一，并进而将民族主义者的怒火导向外部敌对势力。由于政治精英没有分裂族群的动机，或者由于政府的有效控制，人们在中国看不到“大汉族沙文主义”。

那么，政权类型的不同是否可以充分解释中印民族主义的区别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民主不能解释印度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从1949年开始，印度就是一个民主国家（1975年-1977年的紧急状态时期除外），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却历经了辉煌与衰落的变化，而且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印度教民族主义才达到顶峰。为什么民主制度并没能在40年前造就印度教民族主

---

Paul Brass, *The Production of Hindu-Muslim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India*, p. 15. Brass 也举出了几个骚乱首领随后成为政治家的例子。

Thomas B. Hansen, *The Saffron Wave: Democracy and Hindu Nationalism in Moder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

Ibid., p. 5.

Joseph Kahn, "Martial Law Declared in China as Nearly 150 Die in Clashes in Central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 2004, p. 9; Also Jonathan Lipman, "White Hats, Oil Cakes, and Common Blood," in Morris Rossabi, ed., *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义的成功呢？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从 1950 年开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就开始不断地通过分裂国内族群来动员民众。1949 年 12 月，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发动了企图夺回巴布里（Babri Masjid）清真寺的行动。尽管他们动员了数千名激进的骨干分子，但这一运动却未能有效地获得民意的支持，也没能帮助其赢得 1952 年的大选。类似地，民族卫队（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动了数次护牛运动，在 1966 年这一运动以绝食抗议的形式达到了高潮。这次抗议在印度北部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据估算参与民众人数从 12.5 万到 70 万不等，印度人民同盟（人民党的前身）在 1967 年大选中的得票数也因此有了增长。但是，相比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民族主义大潮来说，这些增长仅仅是低限度的。为什么族群的诉求一度为人们所忽视，后来却又受到狂热地支持呢？布拉斯（Brass）断言，护牛运动之所以没有导致选举的成功，是因为“不存在作为要被摧毁的穆斯林结构”，并且“政治环境也并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确实试图围绕穆斯林议题进行动员，在 1992 年，这一议题甚至成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焦点。尽管布拉斯（Brass）指出的第二点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政治环境到底有何不同？如果我们承认政治环境是重要的，那么民主制度就不是唯一的因果性原因。我将会在下文提出：所谓“政治环境”的变化，恰恰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来自巴基斯坦的外部威胁和克什米尔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

从政权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民族主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首先，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就是中央一统的国家。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就不断萌动，并于 60 年代后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异常激烈的形式再次出现。但是，此后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为止，中国的民族主义都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其次，在清政府倒台至 1949 年期间，中国发生多次激烈的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发生了诸如文化大革命等国内政治冲突。

---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 92.

Ibid., pp. 204 - 208.

Paul Brass, *The Production of Hindu - Muslim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India*, p. 7.

但是，无论是 20 世纪 30 - 40 年代的内战，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国内冲突，都不是以族群为分野的。

第二，民主制度究竟助长何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目前并没有定论。在《从选举到暴力》一书中，杰克·斯耐德（Jack Snyder）写道：“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政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时，就如民族主义思潮赋予国家间的侵略行为以正当性一样，这将导致一国内部更可能出现族群冲突。”这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可以发现，民主国家的政客们、特别是那些当政者，就经常利用外来威胁鼓励国民“团结在旗帜的周围”，即团结在执政党的周围。实际上，在预测中国未来政治走势时，几乎没有人会担心中国走向民主将导致“大汉族复兴”，从而出现反对藏族人和维吾尔人的骚乱和示威。相反，研究者们更关心的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国对台湾地区、日本或美国是否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 （二）族群构成、地理位置和行为

也许，问题的答案可从种族构成中寻找。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 92%，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的维吾尔人占总人口甚至不到 1%（据估计，穆斯林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2% 到 5%）。而在印度，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的 82%，穆斯林占总人口的 12%。此外，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居住地比较接近，而中国的少数民族——比如藏族人和维吾尔人——的聚居地远离大多数的汉族人。此外，中国的少数民族包括了许多的族群，而穆斯林是印

---

Jack 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2000), p. 27.

例如,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Edward Friedman and Barrett L. McCormick, eds., *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 (USA: M. E. Sharpe, 2000)。2005 年 3 月下旬，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唯一提到的民族主义类型是排外民族主义。

不过，也有人担心藏族和维吾尔族或许将民主化视为图谋分离的“机会之窗”从而可能招致危险。参见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p. 145。

参见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p. 232; Edward Friedman and Barrett L. McCormick, eds., *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 p. 11。

所有的资料来自中央情报局的 World Factbook。

度最主要的少数民族。

在许多关于种族冲突的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上述事实。这些文献常常不直接涉及本文提出的问题。比如，菲尔容（Fearon）和赖汀（Laitin）颇具影响力的论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因为他们分析的焦点是族群冲突而不是作为族群冲突基础的大众态度。然而，族群冲突与民族主义并不必然是相伴生的。在中国，西藏、新疆以及其他地方，族群矛盾长期存在，但却并没有在这些地区引发大汉族主义。而这正是我希望加以解释的问题，即为什么国内的族群冲突有时能引发强烈的族群民族主义，而有时却不能？

但是，我们不应该这么快地放弃从族群人口统计学上所做出的解释。人口统计学的解释与人们的直觉相符：当人口数量多到足以构成威胁且彼此间接触足够密切的话，这只能在族群之间造成相互不良的感觉。在印度这一门槛可能已经被突破了，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上过于疏散，从而不至于引发大汉族主义。这种观点虽有合理性，但却不能令人满意。

第一，同政权类型这个变量一样，这种解释最重要的问题是，难以用民族构成来解释不同时期民族主义的变化。自从独立以后，印度的宗教信仰始终是多样化的。那么，为什么反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巴分治时突然爆发，以后又在直到 80 年代末这么长的时期内保持沉寂呢？而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解放后，西藏和新疆的汉族人口数量增加了，但这种并未导致针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暴力活动的增加，也并没有使全国范围内的大汉族主义有任何增长（尽管少数民族对这一政策并不尽皆满意）。

第二，根据这种解释，我们应该能够发现的推论是，在穆斯林人口比例更高的地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将更为严重。但有趣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无论以何种方式衡量，在古杰拉特邦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支持都非常强烈；但是，与其他印度教民族主义较弱的邦相比，古杰拉特邦却拥有高得多的印度教徒比例（90%）。相反，在穆斯林人口比例低的地区，

---

例如，可参见 Gardner Bovingdon, "Heteronom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Morris Rossabi, ed., *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 p. 122.

Kanchan Chandra, *Why Ethnic Parties Succeed: Patronage and Ethnic Headcounts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4 - 25.

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支持却不成比例地高。阿素托史·瓦施尼 (Ashutosh Varshney) 通过定量研究得到的结论是, “一个城镇中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与该城镇内发生暴乱的频率之间不存在重要关联”。

第三, 在许多人那里, 印度并没有被看作是拥有某个规模很大的少数族群的国家。例如, 在其颇具影响的《冲突中的族群》一书中, 霍洛维茨指出, 印度的族群划分是“分散的”, 即没有一条压倒性的族群裂痕。他还将印度视为族群合作的一个典范。这或许表明, 人们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重要的族群分野时, 所依据的并非是族群构成的结构, 而是对冲突所持有的看法 (因而是同义反复的推理)。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最主要的不满之一, 恰恰是认为穆斯林不公平地获得了政府的优惠待遇。而在中国, 对于那些可能的大汉族主义者来说, 要找这种借口实在是太容易了。中国允许少数民族以更低的考试成绩进入大学学习, 在计划生育政策中对少数民族也很宽松。此外, 像印度的穆斯林一样, 中国的一些极端少数民族势力也曾谋求从中国正式分离出去。比如, 1959年的西藏暴乱和1989年部分藏人在大昭寺 (Jokhang Temple) 的反叛行为。维吾尔族疆独分子也图谋建立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国, 他们在各种场合也使用了各种暴力手段。苏联解体后, 特别是在中

---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p. 314. 这提出了不少的理论性问题。Fearon 认为, 由于占人口多数的族群无法做出可信的足以在日后约束自己的权力, 从而冲突总会发生。由此我可以提出的一个推论是, 如果占人口多数的族群人口越大, 族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越高 (因为相较于对占人口总数 55% 的族群而言, 对占人口总数 90% 的族群进行约束的难度明显增加)。James D. Fearon,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the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in D. A. Lake and D. Rothchil, ed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p. 39, 41.

Gardner Bovingdon, “Heteronom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Morris Rossabi, ed., *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 p. 141. 在此无需考虑这些政策是否给少数民族带来了净收益。重要的是, 这些政策一直存在。我们知道, 20 世纪 80 年代中, 在印度的 Shah Bano (印度一穆斯林妇女的名字——译者注) 案件中, 印度教徒曾提出, 不能允许穆斯林自行决定遵守哪部婚姻法。同样, 如果需要, 大汉族主义者也完全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些优惠政策当作不满的借口。关于 Shah Bano 案件, 可参见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p. 249。

例如, 参见 Morris Rossabi, ed., *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 p. 16。

亚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后，这种暴力活动甚至有所加剧。从而，问题便可以再次提出来，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印度穆斯林也在该地使用同样的策略）集聚壮大起来，而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却不能因西藏或新疆而勃兴呢？

### 四、外部威胁与中印民族主义的差异

在笔者看来，关于中印两国民族主义的不同性质，一个重要但又常被忽视的解释变量是两国各自面对的外来威胁的结构不一样。我的基本假设是：

(1) 当民族主义者的愤怒被引向目前正对本国构成威胁的外国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将达到其爆发的临界点。如果有可能，民族主义者将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在与外部威胁国有联系的本国人或团体身上。

(2) 虽然外部威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对一国领土完整的威胁以及该国政府表现得相对软弱是导致该国民族主义爆发的一个潜在导火索。

#### (一) 从空间的变化考察中印外来威胁的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最突出的领土争端要么与西方国家要么与日本有关，其中香港和台湾问题最为重要。而印度与西方国家之间没有突出的领土问题；相反，其最重要的领土争端是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议。尽管领土问题是很重要，但其他安全问题也同样重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紧张程度持续上升，其突出表现是：1989 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1995 - 1996 年近乎使用武力的台海冲突；1999 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 年的中美 EP-3 撞机事件。就印度来说，在 2001 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几乎酿成战争；而且在同年，一群恐怖分子袭击了印度国会大厦，据信他们来自巴基斯坦。中印民族主义差异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主要外部威胁

来自西方（虽然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很少）；而印度的主要外部敌人是巴基斯坦，这是一个非西方的对手；另外，印度国内还居住着与巴基斯坦信奉同一宗教的众多教徒。

中印民族主义第二个重要的对比是，看看他们是否存在共同之处。在论述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者中，几乎都会谈到历史上西方带来的屈辱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印度也有一段类似的（如果不是更痛苦的）屈辱经历。然而，相较于中国被列强瓜分为多块势力范围的遭遇，印度经历了英国施加的时间更长且更具侵略性的殖民统治。故此，要想证明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是由历史屈辱所造成的，就需要我们去解释：为什么类似的帝国主义侵略经历却不能在印度引发同样的民族主义。与此研究路径不同的是，本文力图证明，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外来威胁而非历史屈辱感，引发了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而在印度，由于不存在西方的威胁，从而其民族主义就不那么强调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历史耻辱。

### （二）从时间的变化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

上述论点是否与中国的事实相符？首先，在过去的 50 年中，中国民族主义者发起的主要强调“历史耻辱”的抗议，都发生在与西方关系的紧张时刻或者紧随其后。中国学者贾庆国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外部因素驱动中国民族主义示威的观点。第二，不同时期中国对民族主义表述的变化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尽管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做了大量工作，认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为排外，但他们往往把排外的民族主义视为 20 世纪中国政治现象的常态。比如，赵穗生在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时，称其为“中国最有害、最无情和最顽固的现象”。但事实上，在过去的 56 年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范围

---

一个例外是，现在中国大陆居住着一个人口数量很大的台湾族群（大约 50 万人）。然而，在海峡局势紧张之时，他们并没有受到攻击。我认为，这是因为台湾本身不被视为一种威胁，相反，如由于美国这个坏人的干涉而造成台湾可能被分离出去，才被视为对中国的威胁。

Jia Qingguo, "Disrespect and Distrust: the External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Feb. 2005, pp. 11 - 21.

Zhao Suisheng, *A Nation - State by Construction*, p. 2. Also see Peter H.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p. 47.

和强度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一定是某些其他的因素造成了这些起伏——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不能用常量来解释变化。

1949 年后的中国战略安全政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个分期与民族主义者耻辱感的爆发密切相关。在第一阶段，中国与苏联建立了安全联盟，与美国维持了敌对的关系并在朝鲜战争中与之进行了直接的军事交锋。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者针对美国的抗议非常激烈。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直到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在此期间，中国奉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也就是说，中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尖锐的反西方（和反苏）言词以及对外国财产的攻击为这一时期排外性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其中“红卫兵”在 1967 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最为著名。第三阶段，从 1973 年到 1989 年中国奉行与美国进行“协商性合作”的政策。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得以降温。最后一个阶段是从 1989 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外之间紧张关系有所上升，同时双方又保持着既是战略伙伴又是战略竞争对手的模糊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关于国耻辩论的再度复兴。

彼得·格里斯 (Peter H. Gries) 很好地说明了人们对民族主义态度的变化过程。迟至 1990 年，大多数民众对政府主办的纪念“抗美援朝”战争 40 周年活动持一种不甚关心的态度，人们对这类庆祝活动似乎有些“充耳不闻”。但到了 2000 年，庆祝“抗美援朝”50 周年的游行活动却得到了人们的热情参与。类似地，1995 年中国纪念二战胜利 50 周年显得比较低调，但当

---

Jia Qingguo, "Disrespect and Distrust: the External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ism," p. 15.

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S and China 1969 - 19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针对日本的抗议活动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然而，这些抗议是由日本政府采取的当前举措引发的，尤其是日本违反自己的宪法，使国防预算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1%。参见 Allen Whiting, *China Eyes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34 - 135。进一步而言，80 年代中期反日情绪高涨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消失了，中日之间的安全合作已不那么紧迫，日本增加国防预算不再被视为是对苏联威胁的反应，而是被看作对中国的威胁。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是排外民族主义发展的条件。

Peter H.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p. 58.

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时，中国不但密集放映了文献记录片、抗战连续剧，而且还开展了大规模关于抗日战争的宣传活动。显而易见的是，历史事实本身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历史“耻辱”与民族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政权类型没有发生变化，民族构成也没有变化，变化了的变量是外部环境中的威胁。

这一解释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当中国在对外问题上（尤其在涉及领土完整的问题上）看上去“软弱”时，民族主义者的抗议示威就会出现。以此为背景，考察中国对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的反应将会非常有意思。在举行了欢快的庆祝活动的同时，并没有出现愤怒民众的示威、焚烧英国旗帜或攻击英国使馆的行为。在1999年的澳门交接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此类状况。这两个案例中，民众反应低调的关键在于中国没有被认为是失败者，而且中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最后，对我的论点来说，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对所能“攻击”的国内外敌目标进行了“攻击”。1999年，美国驻华使馆遭到了石块“攻击”。2005年4月，在很多城市发生了日本在华一些商业设施和领事馆遭到“攻击”的事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印度的时候，当我认为印度民族主义的高涨源于印度人对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的愤怒时，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印度国内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如此之多。我的猜测是，倘若中国国内有更多的可供“攻击”的目标，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将对之进行“攻击”的话，那么这种暴力结构说不定就会与印度相似了。换言之，之所以在印度看到了更多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是因为在印度境内居住着诸多的穆斯林；而在中国，这类与外敌有关的目标很少，因此“攻击”活动也就更少。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非事实推理，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 （三）从时间的变化来考察印度的民族主义

对中国所做出的上述观点显得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矛头

被明确地引向了外部。而用其来解释印度则似乎有些困难，因为印度民族主义的矛头主要指向国内的一个亚群体。必须承认的是，很多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确实是将攻击目标指向国内政治目标。对此，我并不打算否认。我的观点只是想说明，印度民族主义者也有对外政策目标，而且至关重要，只有当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对印巴关系产生不满后，民族主义这一动力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

首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曾经明确地利用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印度所构成的“包围”，来挑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早在1950年，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利用克什米尔问题来兴风作浪。当时一些国大党议员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表示了充分的同情：“这一派别的国会议员希望结束国会对巴基斯坦的绥靖政策。……他们显然支持莫克尔支（Mookerjee）博士和普鲁斯特曼·坦都（Prusshottam Tandon）先生（印度教民族主义领袖）。……他们认为这不像总理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关于支持教派主义或者反对世俗主义的问题，而是向巴基斯坦这个决心与印度作对的好斗国家表明我们的勇气和力量的问题。”

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要求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主张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量的退伍军官加入了人民党。就如雅夫洛（Jaffrelot）所说：“促使大多数退役军人加入印度人民党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好战的印度教。……对于人民党的成功，颇具共识的解释是……其主张坚定地捍卫边疆、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除了克什米尔问题，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利用来自巴基斯坦和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威胁来获取支持。在讨论克什米尔和孟加拉国的问题时，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民党领导人阿德瓦尼（Lal Krishnan Advani）声称，印度“正在逐渐被敌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包围”。的确，很多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导人都称穆斯林居多数的城市为“小巴基斯坦”。

---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 98.

Ibid., p. 434.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 484.

Paul Brass, *The Production of Hindu - Muslim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India*, p. 36.

其次，当有迹象表明印度在与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的独立武装分子的较量中处于弱势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就更有影响的空间。尽管笔者在此不可能列出关于克什米尔冲突（更主要的是和巴基斯坦）的完整大事年表，但最重要的事实是，从印巴分治到 1987 年，印度毋庸置疑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打过三场战争（1947 年、1965 年和 1971 年），印度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些冲突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都试图以反巴基斯坦的言论来动员公众。的确，这些冲突“通过显示来自巴基斯坦永久的威胁，加强了印度人民同盟（Jana Sangh）的合法性”。同盟的领导人声称，在冲突期间，印度境内的某些穆斯林的行为值得怀疑，并暗示这些穆斯林可能在未来的印巴冲突中组成第五纵队。可问题在于，他们往往被诘问道：当印度在每一次战争中都完胜巴基斯坦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如何能声称国会对巴基斯坦态度过于“软弱”呢？因此，雅夫洛正确地指出：“英迪拉·甘地政府通过对巴军事上的胜利把人民同盟抛在了身后。”

但是，1987 年这一切都改变了。尽管对于谁应该承担责任还存有争论（一些人将责任归于 1987 年印度大选舞弊，而另一些人则将其归咎于 1989 年后巴基斯坦的袭击，当时巴情报局在冷战后拥有了从未使用过的资源），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克什米尔冲突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斗争演变成了长期的、持续性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虽然调动了更多的军队和物资，但印度还是处于明显的劣势。到 1989 年，局势开始急剧恶化，进攻和恐怖袭击不断增加，亲印度的领导人也遭到暗杀。印度对克什米尔的控制 50 年来第一次陷入危机。

正是在此背景下，印度举行了 1989 年的国会选举。所有观察家都认为，这场大选标志着印度人民党的力量得到根本性的加强。这一年人民党第一次在大选中获得超过 10% 的选票。而当 1991 年克什米尔正陷于冲突时，人民

---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 192.

Ibid., 242.

Sumantra Bose, *Kashmir: Roots of Conflict, Paths to Pea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

Ibid., pp. 95 - 96.

党在四个邦赢得了多数，全国总得票数也翻了一番，达到了 20%。此外，较之于 1988 年沙·贝努（Shah Bano）事件爆发之前只有零星增加的骚乱，1989 年和 1990 年死于教派骚乱的人数大幅度地增长了五成。雅夫洛将人民党的胜利归功于“新宗教仪式的发明，对罗摩神话的重新解读，坚持阿约提亚在一定意义上是印度教中心的主张”以及国大党失去人们的尊重，却丝毫没有提及克什米尔急剧紧张的局势。雅夫洛的观点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过去的 40 年中，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断通过类似的方式动员公众，为什么直到此时才获得成功？事实上，其他分析家已经提出了别的阐释逻辑。阿素托史·瓦施尼认为，“克什米尔问题一直居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中心。随着克什米尔危机的再度出现……印度教民族主义获得了一种新的政治推动力。”

的确，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选中，当克什米尔局势紧张或发生了据信是由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活动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就会取得成功。而当这些问题不是那么突出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就会逊色不少。1993 年克什米尔的紧张局势降温的时候，人民党的发展势头就不是很理想。然而，到 1998 年大选时，人民党再度获得了发展的动力。1998 年夏天，在印度声称击落一架侵入其领空的巴基斯坦海军飞机后，克什米尔的“武装活动明显增加”。局势随即升温，暗杀活动激增，印巴关系总体上也趋于紧张。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下，人民党联盟取得了 1998 年 10 月大选的胜利。如维多利亚·斯科菲尔德（Victoria Schofield）所说：“……国大党无法削弱人民党在克什米尔战争中获得的政治优势。”人民党领导的联盟第一次赢得了执政权并成功地维持了联盟（瓦杰帕伊在 1996 年仅做了 13 天总理）。1999 年，卡尔吉尔

---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pp. 233 - 34. 人民党以前平均得票数占总数的 7%。阿素托史·瓦施尼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在过去 100 年里都是一种虚弱的政治力量”。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 552.

Ibid., p. 403.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Victoria Schofield, *Kashmir in Conflict: India, Pakistan and the Unending War* (London: I. B. Tauris, 2003), p. 220.

Ibid., p. 223.

(Kargil) 边境冲突使“持强硬立场的民族主义”席卷全印度，其结果是人民党再次赢得大选。不过，随着克什米尔局势趋于缓和，印巴对话也有所进展，随即人民党在 2004 年大选中丢掉了政权。这一结果让多数观察家大跌眼镜。

事实上，很多人都已指出了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度国内政治中的重要角色。根据罗伯特·维尔辛 (Robert Wirsing) 的估计，在 1994 年，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 (约占总数的 90%) 都支持人民党关于废除给予克什米尔自治权的第 370 条款的主张。维尔辛 (Wirsing) 认为，“人民党现在不再是真的诉诸作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长期敌对之焦点的地方自治主义……而是诉诸印度教民族主义。人民党不会也不能再依靠阿约提亚这张‘牌’了：这一议题虽然很好地迎合了人民党的底层支持者，不加修辞便能蛊惑人心，以及非常适合用来煽动暴乱，但它并不太适用于吸引政治上至关重要的印度中产阶级。对中产阶级来说，更重要的是克什米尔问题，在南北印度这一问题都有着强大的爱国主义吸引力。”

这里有两点是很明显的。第一，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并不能用国内的地方自治主义问题来动员足够的民众支持其赢得政权，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阿约提亚和护牛运动的失败。第二，因为印度在这一地区面对着外来威胁，所以克什米尔问题关系到爱国与否的问题，民众对此反应强烈。的确，很多印度人不但对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干涉而愤怒，而且对一切外来势力的干涉表示愤慨。2001 年 12 月在印度国会大厦遭恐怖主义袭击后，就是因为这种缘故，人民党的支持率才大幅飙升。在印度的议会民主制中，增长几个百分点的得票数就能导致政治权力的显著增长。由于教派原因

---

Sumantra Bose, *Kashmir: Roots of Conflict, Paths to Peace*, p. 141.

对于大选的全面分析，可参见 Wilkinson 的论述。Steven Wilkinson, "Elections in India: Behind the Congress Comeback,"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1, pp. 153 - 168.

Robert Wirsing, *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 Disputes: on Regiona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 166.

Ibid., p. 166.

Robert Wirsing, *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 Disputes: on Regiona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p. 165.

而赢得厌恶穆斯林的选民的支持并不足以保证获胜。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需要借助“外来威胁”赢取新的支持者来帮助他们越过转折点。

人民党很清楚这一动力。萨蒙垂·罗斯 (Sumantra Rose) 写道：“种种特别的迹象表明，右翼印度教宗派主义者喜欢利用克什米尔地区持续的内外冲突来达到自己的国内政治目的。”斯科菲尔德 (Schofield) 也赞同这种解释。他认为，当人民党在一些重要的邦、包括 2001 年 2 月在北方邦 (Uttar Pradesh) 输掉大选的时候，人民党就“试图通过谴责巴基斯坦支持‘越境恐怖主义’来转移视线”。

尽管看起来有些愤世嫉俗，但这些努力往往有真实的核心内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希望把自己装扮得比国大党更激烈地反对印度的一切外敌。也就是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给印度带来严重安全威胁的外来目标上。在 1962 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尽管这一冲突与国内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印度人民同盟仍鼓噪印度采取诸多最富进攻性的对华战略，包括断绝外交关系和大规模报复。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就试图将自己标榜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同样地，在印度决定成为核国家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故伎重演。一位分析家认为，“核民族主义在印度的兴起直接起因于人民党在权力中心的崛起”。

尽管在对印度的外敌上人民党的表现更具民族主义姿态，但在国内政治上却并不总是比国大党更为“亲印度教”。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人民党与锡克

---

对基于“得票最多者当选”的英国式单一席位选区制度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印度的族群冲突，目前学术界虽然存有争议，但总体来说，人们认为“比例代表制”会导致族群之间更大的冲突。不过，阿素托史·瓦施尼指出，因为穆斯林在地理上的分散分布，他们的权力因而被扩大了。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p. 82。对于印度选举制度的详细讨论可参见 Pradeep Chhibber and Ken Kollma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Party System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mantra Bose, *Kashmir: Roots of Conflict, Paths to Peace*, p. 219.

Victoria Schofield, *Kashmir in Conflict: India, Pakistan and the Unending War*, p. 240.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p. 178.

T. T. Poulouse, *The CTBT and the Rise of Nuclear Nationalism in India: Linkage Between Nuclear Arms Race,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New Delhi: Lancer Bokks, 1996), p. viii. 还可参见 Thomas B. Hansen, *The Saffron Wave: Democracy and Hindu Nationalism in Modern India*, p. 232. Hansen 指出：“在朝向拥有核力量的道路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迈出了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几步，这并非只是一个巧合。”

人党 (Akali Dal) 的关系。在 20 世纪 60 和 80 年代, 锡克族政党曾经强烈要求旁遮普自治或独立。锡克族运动也同样伴随着反印度教暴动和示威, 以及针对印度教目标的恐怖袭击和暗杀等活动。基于此, 人们一定会认为人民党将强烈反对锡克人党。但事实上, 无论印度人民同盟还是人民党都与之结盟。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这一案例中, 民主体制确实改善了族群间的紧张关系, 因为人民党和锡克人党同为少数党, 在国会中有着共同的敌人。

但这一逻辑无法充分解释人民党对待锡克人党的立场, 因为还有大量的少数党并没有与人民党结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 尽管在旁遮普省有反印度教的行为, 锡克人党和锡克运动都坚定地反对巴基斯坦。事实上, 在印巴分治期间, 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曾经并肩抗击巴基斯坦, 250 万的锡克教徒从巴方一侧的西旁遮普逃往印方一侧的东旁遮普。因此, 并不存在锡克政党在印巴冲突中支持巴方或充当第五纵队的危险。当然, 考虑到锡克族人在印度军队中的庞大比例, 人民党很可能已将他们视为印度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的一点是, 在不损害其对巴立场的情况下, 人民党愿意从印度教民族主义教义上让步, 以此来换取选举的优势。

### 五、结论与启示

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导人是真的关注克什米尔和遏制巴基斯坦, 从而利用国内对穆斯林的愤怒来召集支持者? 抑或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是利用公众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愤怒来推动国内政治议程呢? 答案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笔者认为, 不管两者之中哪个因素更多, 如果没有克什米尔问题和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 印度教民族主义就不会获得现在的实力, 也不会越过胜选的门槛。类似地, 在中国究竟是政府在利用公众, 还是大众民族主义在推动政府?

---

Atul Kohli, ed., *India's Democracy: An Analysis of Changing State - Society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9.

有资料披露人民党曾鼓励穆斯林精英加入本党。这种做法与纳粹主义显然颇为不同。当年的德国犹太民族主义者曾想加入纳粹政党, 但无缘入其门。参见 Thomas B. Hansen, *The Saffron Wave*, p. 225;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p. 231。

显然，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本文的目的旨在说明一点，即如果没有外来威胁，民族主义就兴不起风浪。

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 1949 年后的不同时期，中国国内确实存在着各种汉民族主义，这就如同印度人中也存在着各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一样。实际上，这些人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都会存在。本文力图解释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存在这些人，而是为什么有时候在某些地方这些观点能够流行，而在其他时期和地方却不能。雅夫洛 (Jaffrelot) 认为，之所以有这种不同，是由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断改变的策略。本文力图论证的是，如果没有来自巴基斯坦特别是来自克什米尔的严重威胁，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出于同样的逻辑，如果没有西方对中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也不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重现。政权类型和族群构成这两个变量是重要的，但就这两个案例而言，它不能充分解释我们观察到的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对外部威胁的一种反应，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两国的民族主义者将愤怒的矛头对准与威胁有关系的本国目标——在中国可能是日本商业设施或者西方使馆，但日本人或美国人并没有成为民族主义动员所反对的目标。而在印度，国内众多的穆斯林成为民族主义者发泄政治愤怒的目标。

当在国内存在一定数量的与外来威胁有关系的少数民族时，那么这种威胁将引发族群民族主义。但是，是否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国家反对族群分离主义的行为能否引发广泛的族群民族主义呢？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前文在族群构成统计学那部分所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能看到缘于克什米尔问题而出现的印度族群民族主义，但却不能在中国看到因西藏或新疆问题而引发的族群民族主义呢？我的答案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确证了刚刚提到

---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民族主义的“外溢”，即族群民族主义由于外部威胁而泛滥。类似的例子还有二战期间美国人对日裔美国人的态度，当时外来威胁从根本上重塑了美国人对日裔美国人的看法。

Fearon 也指出，一国如果与相似族群构成的国家相邻，其国内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因此而加剧。

的颠倒过来的逻辑，即如果一个族群与某个外来威胁无关，那么即使存在冲突，该族群也不会成为民族主义动员的针对对象。在中国，无论是藏族人还是维吾尔人，更不用说满族人、回族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他们与中国的外部威胁都没有关系——并不存在一个意欲吞并西藏的藏族国家逼近中国的边境。而印度的形势就非常不同，其最大的少数民族与一个试图夺走印度一块领土的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一个例外是蒙古，但一个 300 万人口的国家远不足以对中国构成威胁。相反，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显然对印度构成了威胁。）第二，中国失去新疆和西藏的可能性要比印度失去克什米尔的危险低得多。然而，这种相关性表明，两者在可能丧失领土和面临外部威胁从而使族群民族主义赢得多数民众的方面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共同之处。

简言之，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异少同多。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和印度的共同之处是，只有当国内存在着与外来威胁有着实质性关系的很大群体的情况下，作为外来威胁之反应的民族主义才能取得成功。

为了评估族群构成变量和外部威胁变量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有益的反事实思考：如果中国有更多的藏族人 and 维吾尔族人，中国是否会产生激烈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小。其实，看看孙中山做出的决定，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尽管孙中山最初是一个有着强烈反满情绪的族群民族主义者，他随后转变了态度，支持包括各族群在内的中华民族主义，这使他能够集聚起足够的力量以驱逐西方帝国主义者。如果中国国内存在更多的极端主义的维吾尔或藏族人口，新一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将很可能做出相似的决定。同样地，如果印度面对来自西方的主要威胁，那形势会是怎样的呢（倘若彼时巴基斯坦没有与这种来自西方的威胁结盟）？这原本是印度国大党内的民族主义者们最初面对形势。这些民族主义者和孙中山一样，决定保持国内团结来共同对付外敌。但是，现在的印度却不再有这个选择，因为已经不存在来自西方的主要敌人以及西方支持下的对其领土的威胁。印度目前最主要的外敌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少数民族。

有一个隐含的问题值得深究。在印巴分离的过程中，也就是早在 1947 年作为外来威胁的巴基斯坦成立之前，针对穆斯林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力活动就以骇人听闻的形式出现了。我对此的解释是：尽管早在世纪之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就开始了政治动员，但只有当穆斯林可能组成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暴力活动才会爆发。这一事件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时间范围，我也无意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但这一观点符合本文的总论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没有成为印度的外来威胁，那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获得权力的道路上会更加艰难。即使印度国内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更高，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也将大大减少。为此，我们值得思考一下下面两段引文。阿素托史·瓦施尼写道：“穆斯林最终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主要对手，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数量，还有就是因为在 1947 年以巴基斯坦形式出现的穆斯林国家造成了印度的分裂。”在谈到分割孟加拉的时候，谢卡尔 (Sekhar Bandyopadhyay) 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47 年当孟加拉将被分割成两部分并分属于印巴两个独立国家时，这一地区的政治联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形势清楚地指明了一点，即就政治行动而言，南亚殖民地不存在‘实质性’的共同体边界。当大环境发生改变，未来的政治地理边境威胁到对生活在地带地区的共同体进行分割时，共同体的边界同样将开始发生变化，新的政治认同也将随之产生……。”两位作者都暗示，直到伊斯兰变成一种来自他国的外部威胁时，印度教民族主义才开始摆脱虚弱的状态。

本文的观点在预测中印两国民族主义的未来发展进程方面具有清楚的含义。如果印巴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的暴力活动得以减轻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对人民党支持的降低，暴乱活动的次数也会减少且激烈度下降。在中国，除非某个少数民族开始依附于一个对中国统一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国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纳 (Jinnah) 创建巴基斯坦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保护穆斯林少数民族免受印度教徒这一多数族群的歧视。但是，本文证明，从长远来看，真纳的建国之举却强化了印度境内针对穆斯林的种族歧视。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p. 231.

Mushirul Hasan and Nariaki Nakazato, eds, *The Unfinished Agenda: National - Building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Manohar, 2001), p. 151.

家，否则，笔者不认为大汉族主义能够复活。

本文的观点也具有理论上的含义。首先，通常认为外来威胁会增进国内团结。对此，本文作了常识意义上的补充：只有当国内的政治主体中不存在与外部威胁有联系的群体的情况下，外来威胁才能促进国内团结。其次，民主制度并不必然加剧民族冲突。最后，是勃兴的民族主义引发了民族冲突，还是加剧的民族冲突引发民族主义呢？本文认为，至少就中印两国而言，民族主义是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这两个案例都表现出“反应性民族主义”的特点。

## 作者简介

**赵 通** 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研究人员。2005 年在清华大学获物理学学士学位，2007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邮件：zhaot@mails.tsinghua.edu.cn

**李 彬**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1988 年在北京大学获技术物理专业硕士学位，1993 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1993 至 1999 年 7 月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从事军控研究，最新著作为：《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2006 年）。

电子邮箱：libin@mail.tsinghua.edu.cn

**李 盟 (Alexander Liebman)** 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候选人。2001 年在耶鲁大学获历史学专业学士学位，2006 年在哈佛大学获政治学专业硕士学位。代表论文有：“Trickle Down Hegemony?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Dam Building on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2005。

电子信箱：alexander.liebman@gmail.com

**庞 珣**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2000 年在北京大学获国际政治专业和经济学专业双学士学位，2003 年在北京大学获外交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制度和能源外交。

电子信箱：pangxunhelen@vip.sina.com

**余建军**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讲师。2002 年在江西师范大学获得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6 年在复旦大学获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在《美国研究》、《欧洲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电子信箱：yujianjun777@hotmail.com

**徐建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候选人。1997 年在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国际事务方向）学士学位。2005 年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世界政治理论。

电子邮箱：xujianxin93@sina.com